

别具一格的“戏出年画”

刘莹

发达的农耕文明,先进的农学思想、悠久的重农传统,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理念,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才催生了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的知识宝库

徐旺生

“四时经雨水,乡国忆桑耕”。雨水节气来到,全年的农业周期才算正式开始。从立春到雨水,两个节气的更替,降雪变为下雨,越冬作物开始返青,草木萌动,世界一派生机盎然。

农历二十四节气,是古代中国人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变化规律所形成的完整知识体系。“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从这首中国人几乎都会背的二十四节气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卓越观察力和创造力。虽然我们有了很多关于气候关于农业的科学知识,但二十四节气从未过时。它不仅是深受农民重视的“农业气候历”,同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二十四节气”无疑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农业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早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就驯化了水稻和小米等作物,栽桑养蚕,驯养动物。主要的农业区在黄河流域,那里处于中纬度,四季分明,人们可以观察到不同时期的气候变化与物候特征,周而复始。但只有农耕文明并不足以产生二十四节气,还要有发达的天文学。古代中国的天文学相当发达,欧洲文艺复兴以前,中国是世界上天文现象最精确的观测者之一,也是最好的记录保存者之一。中国最古老、最简单的天文仪器是土圭,也叫圭表,它是用来度量日影长短的,有了它,就可以确立冬至与夏至时间。然后通过数学推算,将太阳运行一年分成二十四等份,确立每一个节气的日期。

二十四节气又被分为七十二候,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每一候都有动物、植物、鸟类、天气等随季节变化的周期性自然现象,这些现象称为“物候”。比如雨水节气,冰雪融化,春信已发,一候獭祭鱼,二候鸿雁来,三候草木萌。我们可以想象,水獭开始捕鱼了,大雁开始从南方飞回北方,在“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中,草木开始抽出嫩芽。雨水之后是惊蛰,一声春雷惊醒了蛰伏的万物,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鸣,三候鹰化为鸠……这些美好的画面滋养了多少精彩的诗篇。七十二候中同一种动物、昆虫或天气现象随季节轮替会呈现相反或连续的变化,相反的如“玄鸟至”与“玄鸟归”,“蛰虫始振”与“蛰虫始坏”,“雷发声”与“雷始收声”等。

当然,二十四节气传承至今还有很多因素。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争鸣,各种思想相互影响。农家成为其中重要的流派之一,并在诸子争鸣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当时的老庄哲学影响深远,老子强调“道法自然”,庄子崇尚自然,提倡“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自然会影响到后来的农家学派。代表农家的《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等四篇所体现的农家思想,强调与自然和谐相处,则是老庄思想的直接体现。其中《审时》篇用天、地、人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来解释农业生产过程与确定原则,这些促成了内涵丰富、以掌握农时为目的的包含二十四节气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产生。

秦汉时期的郡县制度,催生了影响深远的重农抑商思想,为二十四节气产生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农业在秦汉时期成为整个国家经济的主体,种植成为重中之重,养殖、经商等行业不被鼓励,秦律中耕牛得到特别的保护,随意宰杀耕牛是要判死刑的。没有重农的思想传统,二十四节气也不可能深入中华民族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

发达的农耕文明,先进的农学思想、悠久的重农传统,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理念,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才催生了二十四节气。

今天,二十四节气与农业依然息息相关,什么时候耕地、播种、除草、收获,都要遵循节气之规。比如山西南部是冬小麦的主产区,有节气谚语曰:“麦长四季春为主,十年九春旱”“立春天还寒,麦田浇灌莫停歇”“小满芝麻芒种谷”。即使在四季特征并不明显的区域,也有依节气轴线所产生的一系列农谚,为农业生产提供参考。如东北农谚:“过了芒种,不可强种”,安徽农谚“清明下种,谷雨栽秧”;福建农谚“惊蛰犁头动,春分地气通”……

当代中国农业加入了工业化要素,诸如化肥、农药与机械,其中化肥与农药在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导致耕地质量下降、黑土层变薄、土壤酸化、河流水质下降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同时传承二十四节气背后所包含的理念,更多地利用传统的农耕智慧,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种养结合,循环利用,建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这些都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所要认真考虑的。

二十四节气的思想理念,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人们对“天时、地利、人和”的追求。历代文人墨客用各种形式,不断丰富着节气的内涵,草木鱼虫、天地万物都被容纳在节气的框架中,使今天的我们能有一种与天地感应的诗意浪漫。这也许就是二十四节气永远不会过时的原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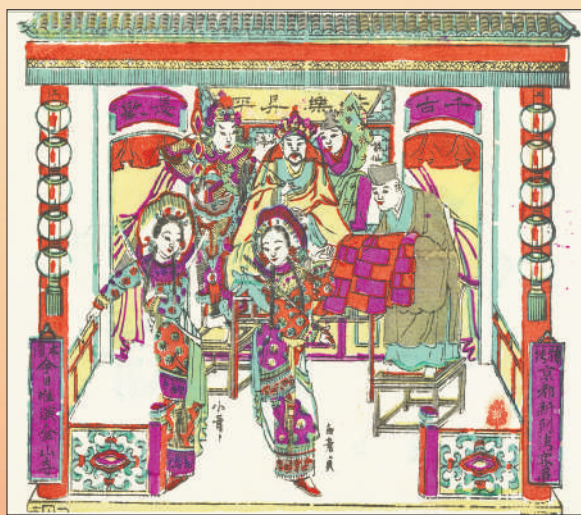
以不同姿态分立于左右两旁的椅子上,表示两人暗地埋伏于屋檐高处,伺机里应外合擒拿费德功。这类武打戏出善于突出角色的功架姿势,将“起霸”等表演程式融于画面中,抓住“老生弓”“花脸撑”“武生在当中”“小生紧”“旦角松”等不同行当的角色特点加以刻画和表现,栩栩如生。武戏年画中这种痛快淋漓的内容,紧张热闹的画面,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

苏州地近上海,受海派京剧的影响,桃花坞清晚刻印的戏出年画多表现花巧的海派京剧舞台,富有鲜明的时代感。在一幅《金山寺》的戏出画样中,背景采用舞台演出形式,道具以一桌三椅显示戏中地点环境,即中间放置一桌,上设一椅,桌旁左右各设一椅。白素贞与小青处于画面前方,法海则坐于后方高处椅子上,表示其在上坡上与二人斗法。画面背景不仅有悬挂横额的上下场门,中间高悬“共乐升平”的横匾,两旁台口红柱上还刻有“特请京都新到清客串”“本园今日准演金山寺”的字样,如实反映了当时京都名角沪上献艺的史实以及旧日戏园建筑和舞台格局的面貌。

山东平度年画师承潍坊杨家埠年画,在发展初期较多移植或复制杨家埠的年画作品,但后期逐渐形成自身风格,尤其以刻印的戏出年画最具艺术性。代表作《空城计》绘制精细,角色装扮、城楼布景,上下场门绣帘、地上铜钱纹方毡等底幕格式也都符合清末民初的舞台演出实景。画中对人物的处理侧重写实,位于画面中心的司马懿脸谱描画工细,面带疑惑,在城门前驻足思虑,其猜忌多疑的性格特点表现得入木三分;右侧的司马师、司马昭两人则满腹狐疑,似在侧耳交谈;画面左侧城楼上孔明手持羽扇,以镇定自若之态观望城下魏军;下方城门内绘有两个扫地老翁,二人的神情、动作尤为生动,其中一人额贴小膏药,以手搭在另一老翁肩上,那老翁则一边打扫一边窥视城外动静,与孔明之镇定恰成对比。画面套用紫色和大片的水绿、水粉色,显得清秀柔丽,代表了平度年画较高的艺术水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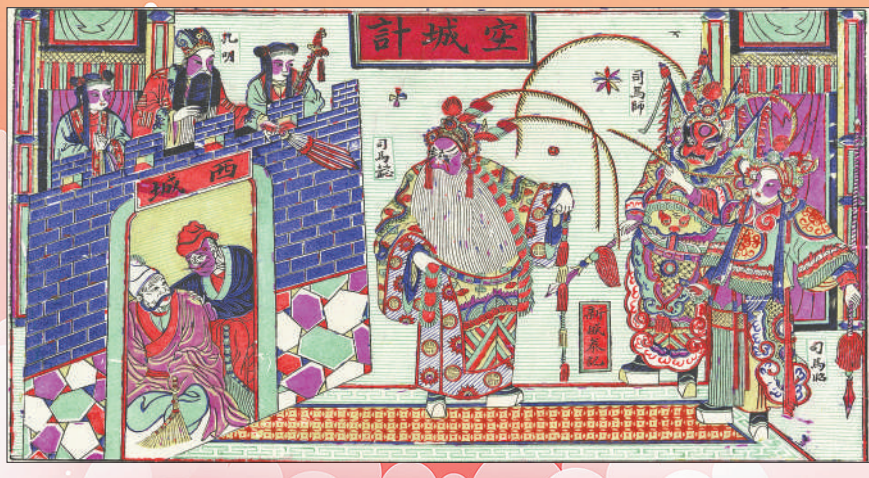
河北武强、山西临汾、山东潍坊、陕西凤翔、河南开封、四川绵竹等都是我国著名的年画产地,各有特色。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也都曾刻印过数量众多的戏出年画,优秀作品不胜枚举,并且多以本地流行的戏曲题材为主,自成体系。尤为可贵的是,不少今天已经失传的戏曲剧目,在戏出年画中仍可以找到弥足珍贵的图像史料,为戏曲史的研究者提供线索。

戏出年画是戏曲与版画两种艺术形式的有机结合,在带给人们视觉享受的同时,更可感知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真是值得传承的珍贵文化遗产。(作者为中国美术馆典藏部副研究员)



▲天津杨柳青戏出年画《拾玉镯》。
▼山东平度戏出年画《空城计》。
▲苏州桃花坞戏出年画《金山寺》。

制图:赵偃汝



《拾玉镯》中,三个角色均手持扇子,却有着不同的持扇姿态,可以说是对这类画诀的灵活、生动运用。

清末武打戏出广泛流行,杨柳青年画中保留了大量精彩的武戏题材,如脍炙人口的三国戏、隋唐戏、公案戏等,一些经典的画样

每年再版重印,经久不衰。《拿费德功》又名《八蜡庙》,是《施公案》中以黄天霸为主角的八出短打武生戏(“八大拿”)中的一出。杨柳青刻印的一幅同名戏出年画中,人物造型干净利落,性格塑造鲜明,画面中央绘费德功中计,受制于张桂兰;武丑朱光祖和武生黄天霸

贮贝器上为什么这么多牛

樊海涛

和谐共存,展示了滇国的生物多样性。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期的“虎鹿牛铜贮贝器”,器盖中央雕铸一峰牛,沿边绕雕一虎、三鹿;器身刻几何纹、鸟、兽纹各一周,三器足为踞跪人形,以头颅与双手承托器身,构思颇为奇特。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西汉时期的“动物搏斗铜贮贝器”上,则出现了激烈的“虎牛搏斗”场景。该器为虎耳束腰筒形,下方四虎爪为器足。器盖中立一株无叶之树,树枝上有两猴、两鸟,树下是二牛一虎的惊魂搏斗。一虎绕树奔跑,左后腿被一牛的巨角挑穿,虎仅前爪着地,后腿腾空。显然,兽中之王与二牛搏斗中处在了下风。树上二猴抱树瑟缩,另一猴四顾欲逃,两只飞鸟在残酷杀气的催逼下,欲振翅逃离……动物搏斗的场面被工匠用戏剧化的场面瞬间定格。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鬃牛祭祀铜扣饰”则表现了滇人斗牛、崇牛的习俗。扣饰最右侧的立柱上站立着一头公牛,柱侧11人正参与缚牛的活动。牛伫立不动,牛角根部系绳,穿在牛颈下结成活结。其他人或抱绳索、或抚牛背、或挽牛尾,其中一人被牛角挑穿大腿,倒悬于牛角上,手仍抓牛绳不放,发髻披散。还有一人倒于立柱下。11人头顶部梳髻,腕臂环戴成串手镯,腰间佩圆形扣饰,小腿束带,跣足。

如果让动物学家来辨认,滇国青铜器上的牛其实是不同的种类。最常见的是一种牛角隆脊的“封牛”。封牛即“峰牛”又称瘤牛,因为其肩背有巨大瘤状突起而得名,曾是亚洲的主要牛种之一。牛背上隆起的峰是它

大的特点。滇国青铜器中还有牦牛、水牛的形象。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狩猎场面叠鼓形铜贮贝器”,出土于晋宁石寨山,时代在西汉。器身刻纹图案中就有一头牦牛立于树下,天空还有一只飞鸟展翅掠过。工匠们细致地刻绘了牦牛身上细密的长毛、巨大的双角、笤帚状的尾巴,让人一望即知。

晋宁石寨山还出土过几件铜牛头,从牛额头直到牛鼻子,都有厚厚的长毛覆盖,从形状分析,应该是牦牛。石寨山处于滇池之畔,西汉时期气候温暖,属于热带亚热带气候,牦牛应该不是本地的,很可能与巴蜀地区的一种牦牛有关。它们在青铜器上出现,说明当时的滇人对生活在高寒山区的牦牛已经有所了解。

1996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晋宁石寨山进行了第五次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一件“鎏金二人缚牛铜扣饰”。该牛背上有“峰”,但犄角却是向下弯曲然后上翘,体型特殊。石寨山还出土过一件类似的牛头铜扣饰,有研究者认为很可能是非洲水牛的形象,具体的种属及来源还待更深入的研究。也许2000多年前,滇国的对外交通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闭塞。



上图为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时期的动物搏斗铜贮贝器。



下图为江川李家山的虎鹿牛铜贮贝器。

寻古探源

文化遗产

古滇国贮贝器上的牛还与虎、鹿等动物